

桂东北瑶、汉族古村落的历史文脉与空间解析

周海军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53)

[摘要] 在历史迁移过程中,桂东北是瑶族切入广西重要源点,因此,桂东北地区古村落以瑶、汉族文化基因融合形成古村落历史文脉的基本基质。通过对桂东北区域古村落调查分析,认为汉族村落布局秩序性、风水观念性、文化象征性对瑶族原生态居住理念带来冲击;然而瑶族“一”字形布局对沿江古镇空间经营模式提供有益启示;瑶、汉族古村落在趋吉避凶、子孙兴旺等人居理想极致追求下,通过不同的空间规划而做到“同质不同样”的村落空间多样性,也体现瑶、汉族古村落历史文脉的融合性、适宜性和延展性;同时,对当代城镇化进程问题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瑶族;古村落;历史文脉

[中图分类号] J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4-0123-06

桂东北与湖南、广东毗邻,地处都庞岭、萌渚岭以南,属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地壳多次构造,褶皱与断裂发育丰富,为典型喀斯特地貌,地表以山地、丘陵、小谷地、小冲积平原为主,而山地、河流、平地、台地、丘陵等多种地理形式环错为其自然景观的基本表现形式。

瑶族为游耕居山民族,喜迁徙,其历史迁移路线基本为淮河流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①。瑶族自北而来进入广西切入点有两个,一为桂北,一为桂东北,桂北地势山高水急,瑶族迁入数量不多;桂东北由于地势相对低平且有小谷地做通道,迁入人员较多,因此,桂东北为瑶族迁入广西重要源点。瑶族进入广西后沿贺州—桂林、柳州交界处—来宾—百色—一线发展,在桂西呈散点扇形敞开,最后进入越南、云南、贵州等地,有一部分走向海外,因此,瑶族在广西迁移特征呈现出一点、一线、一扇的基本样式。桂东北作为瑶族切入广西的重要源点有深厚民族文化积淀,费孝通认为“天下瑶都在金秀”。同时,桂东北是不仅岭南文化重要发祥地,其“三省通衢”的地理优势也集聚了不同地域文化融入,因此,桂东北地区古村落景观以汉、瑶文化融合为基本基质、兼具不同地域

文化融合的表现形式。其融合过程表现为:同地域认同—包容—吸收—融合。^[1]

古村落是传统村落的遗存,指“有幸保存下来的古代村落,其村落地域基本未变,而且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这样的村落即是我们所称的古村落”^[2]。古村落景观是族群对自然空间利用方式及造物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桂东北古村落众多,基本为明清时代遗存,由于瑶族、汉族大聚居特点,古村落在村落选址、空间布局、单体建筑样式、装饰纹样及文化表现等都具有相互影响、融合的特点,因此,探寻汉、瑶族古村落成因与解析空间结构是了解古村落特质的基础,而对古村落文化特质与表现形式解析是探寻对其展开保护与发展策略的前提,其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生态适宜性、文化传承性、精神象征性、传统文化民俗认同性、大公小私的公共性、人造物追求文化品质的极致性,古村落文化传承前期工作为:文化认同—保护—发展策略。

一、桂东北古村落成因分析

(一)桂东北瑶、汉族古村落文化形成本原

广西属百越之地,为壮族人先地。而其作为中

[收稿日期] 2017-03-12

[基金项目] 2014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广西古村镇景观设计特征与文化遗产研究”,编号 14EG156。

2015 广西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古建筑空间特征解析与传承保护研究”,编号 Ky2015yb019。

[作者简介] 周海军(1978—),男,江苏省连云港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央集权的行政区域之一则源自秦始皇,“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发诸尝亡亡之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②以漓江为通道,北方最早来的北方汉族在桂林地区落地生根,通过广西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徙,更多外省人群迁入,以湖南、广东迁入者居多,如富川、钟山等地许多居民操粤语方言,部分汉族妇女依然梳不同于本地扮装的盘头髻;同时,为争夺生存空间,客家人也历经五次大迁徙,部分客家人迁入桂东北,“桂东北的客家人则来自江西者最多,其次为广东和福建两省”^③。关于瑶族,最早记载见于《梁书·张纘传》:“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考,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由于瑶族与朝廷历代关系紧张而导致不断南迁,由湖南南部迁入广西最便捷的通道为萌渚岭、都庞岭中间的低平地带,同时富川、钟山、恭城山区与谷地都为瑶族迁入提供了生存空间,三县西南为大瑶山腹地,山高林密的地理环境也为瑶族提供栖身之所,所以,桂东北居住有数量较多的瑶族。自秦取兵岭南后汉人南迁,壮族聚居区逐渐缩小并南迁或融入汉族之中,但依然有小部分壮族居民,如平乐县津榕村即为汉族、瑶族、壮族三族聚居。

由于桂林地理优势(水路向北经湖南至中原,南有水路两条,分别至浦口、广东,东南亚),“唐代李靖平定岭南,宋代潘美统一南汉,元代进取岭外,明代统一广西,无不用兵桂林。”^④历朝统治者都把桂林做为区域文化、政治中心,由此,历代自中原迁入者带来高势能文化,受此影响,汉、瑶族古村落现保存明、清时代所建汉族古村落有强烈汉文化特征,其中湘赣、客家、广府、中原民居体系都在此有所反映;瑶族古村落特点为在保留本民族审美基础上对区域高势能文化强烈反应与吸附,在外型上反映区域的民居特点,桂东北与桂西瑶族民居差别巨大;壮族民居在桂东北很少表现,其“干栏式”建筑却为外来移民提供了地域适应性的借鉴,因此,桂东北古村落以瑶族、汉族为基质形成文化本原。

(二)瑶、汉文化融合为古村落形成基质

广西瑶族迁徙自隋唐起,桂东北瑶族到宋代过着“食一山则移一山”的游耕生活,至明代王士性则记载瑶人:“居室不喜平地,惟利高山”^⑤。“今日瑶族分

布格局,直接从清代承袭、发展、变化而来。”^⑤清中后期,瑶人游耕、植树、种旱田、初植稻田等几种生产方式并行,并有部分瑶人迁居平地。按照瑶族生活方式变迁带来居住方式的变化,瑶族最基本的宅居为四根木柱支撑,居住空间以柱为虚空间划分依据,四周及顶则以茅草覆之,在调查中,大化县雅龙乡盘免村依然有此种民居。清末,游耕瑶民基本定居,而“居深山,以织竹簟、采樵、烧灰为业”的生活方式说明瑶民依然依恋大山,瑶族按居住地海拔可分为:过山瑶、住瑶、流瑶、平瑶,“山”不仅为瑶民生聚之所,也是生存空间意向;长久居山使得瑶族对山林树木的开发与保护有了朴素的生态意识,对优势树种的培育及经济树木的栽植,使得瑶族获得“树”的民居意向;瑶族不像壮族、侗族、傣族等稻作民族对水的利用形式丰富,但因居山饮水遇到的问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泉水是瑶民的生活依赖,由此,山、树、泉水等成为瑶族村落选址的基本要素。因山居平地狭促及风向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瑶族建筑占地较少且座向较自由,而单体建筑空间实用分割不清晰。瑶族与汉族接触后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较大,如划分居住空间、强化装饰与布局,但保留了重纵深、非严格轴线建筑等特质^⑥。富川凤溪村尽管从外观上看有徽派建筑样式,但其纵深形院落、“一”字形街道依山而建、善于吸收的“沿地取风”却是瑶族文化特质。

汉族依然是桂东北人数最多的民族,现存民居以明、清时代居多,“根据明、清时代移民的民系来源,桂东北汉族主要由湘赣、客家、广府三个民系构成”^⑦。同时,唐宋甚至更早的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明及三个民系的滥觞导致桂东北汉族村落的丰富性,而在长期的融合中,汉族古村落具有“同质不同形”的具体表现。汉族古村落景观节点基本表现为:古树、河流(泉水)、村落院墙、宗祠、村门、巷门;村落整体布局特征:轴线对称、公共空间开阔、适度改造地势、秩序感强;其非遗美学特征体现为:耕读结合、道儒合一,这些特点从村落空间反映出来。

桂东北不同人群来源及文化补给,导致古村落文化层次丰富及表现形式多样,同时,汉族对风水观念的朴素理解、对儒家文化传承及瑶族对山居的生活经验切合,两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基因融合形成本区域古村落文化的基本基质。

① 据费孝通先生《盘村瑶族序》(1982年发表于《读书》)认为:游耕应理解为耕地常常流动的农业;居山指非从古至今的习俗,而是瑶族在不断抗争中,被迫放弃平地,分散聚居在高山区,具有被动性。

② 出自《通鉴·秦纪·二始皇帝下》,第4页。

③ (清)汪森:《粤西丛载》[M]卷18《蛮习》,四库全书本。

二、桂东北瑶汉古村落空间特征解析

(一)村落选址的风水理念

风水又称“堪舆”，是建筑与环境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研究体系。在“趋吉避凶”的生存理念下，对自然生态的切入利用，因聚落、建筑选址而产生，对自然的态度表现为：利用—治理—敬畏，即顺、用、变的流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利用宏观思维模式，力图把握“风水无形，动流有律”的规律，从而找到更改风与水流向的策略。而顺应自然的第一步即利用自然“藏风得水”的好气场原生态，所以山、水的考量为选址的首要要素。理想自然人居空间包括：龙脉、砂、穴位、四灵兽、案山和水。即龙脉自始祖山开始至父母山（玄武靠山），山前为明堂（村落），两侧来水汇聚，远处有案山呼应，两侧水外有青龙白虎二山。即“生气”自始祖山源源不断流来，至村落前“界水则止”，再加上案山呼应，以达到“藏风得水”的目的。但最理想自然与现实总有差距，因此，对“水口”的处理成为村落选址以后的重要形式。^[8]

桂东北具有良好山水生态，山水相依，成为古村落选址的良好人居环境。汉、瑶古村落选址的共性在于：后有山（瑶族称后龙山，汉族称祖山），前或一侧有水（泉水汇集成的溪流、大河流经），差别在于：汉族一般在山脚下或平地上凸起的小高地，瑶族居住海拔相对较高，对水体的利用，瑶族更倾向于实用，汉族则在实用的基础上有一定象征意向。瑶族如富川秀山村、秀水村、风溪村；钟山大田村、荷塘村、金秀上古陈村、下古陈村等，村落距离泉水一般在一千米左右，引水流经村落或在村落前流过，水体径流量不大，人居离泉眼有一定距离，有利于保护水质。汉族村落如兴安水源头村、恭城费村、灵川上桥村、江头村更倾向负河水一侧选址。

“水口”^①是汉族村落对水体的改造形式，通常建以桥、古亭、古道、古树等，具有最早的公共园林之意，有单层与多层之分，通常为单层水口，随着村庄增大，水口即向远处推展而形成多层水口。瑶族不仅受汉族影响也受侗族影响，有汉族水口园林之意，也有侗族风雨桥形式。但桂东北古村落在选址上普遍注重山、水、树及周围环境的适宜性。

(二)桂东北古村落平面空间布局

受地形、气候、风水观影响，桂东北瑶、汉族古村落呈现两种平面布局及延续脉络，即瑶族的“一”字形与汉族“山”字形，“一”字形延展为“叶脉”形、“人”字

形、“环”形，“山”字形延展为“芭蕉叶”形，两种形式最终融合为“环”形。两种布局都具有良好边界且防御性较强；精神审美具有差异性，即汉族更倾向于“风水”观念与精神审美，而瑶族倾向于自然生态性，两种观念融合则具有风水意义为主的生态性，其精神内核则有“祈福纳祥”的民间空间审美。

桂东北山水相依为瑶族提供了居山的理想选址，山脚之上选址意即有“后龙山”为靠，有精神依赖性，但适宜开拓建筑空间不大，因此，“一”字形布局为最佳选择，其优势在于体现了族群成员享有占据空间的公平性，道路通达度高、防御性好。基本构架为由寨门进村，“一”字形街道随山势呈弧度走向（如金秀六段村），街道作为公共构筑物，一般都做硬化处理，且注重排水，排水沟一般为40厘米深，街道由“三石”（一般为青石，就地取材，）铺设，称“三石街”，若引水入村，水流则流经主街道一侧，河水上面隔一定距离铺设青石板，也有用卵石铺设，街道两侧为民居，村落另一端也由巷门结束。若村落人口增加，则沿山势横向发展，遇另一山则拐，出现“人”字形构架（如钟山巨塘村）；则向主街道两侧扩展，形成“叶脉”形（如富川深坡村、秀山村）。

汉族秉承儒家秩序观念，发端于“山”字形村落，讲究中轴线对称，布局清晰严谨。受“风水”观影响，一般选址为负阴抱阳，即村后为“祖山”，却不喜欢在山脚下建村，最好山前有一片小高地（且开阔），先建村寨大门和村庄院墙，界定村落人居空间，体现了人居的捍卫种族领域的土地观念，此类型院墙最突出的是富川红岩村，红岩村又称“石墙村”，全村院墙由4米长石板砌成，如长城般稳固。“山”字形村落由村门进入，正中为空场地，有现代广场的意义。村门精神节点有三个，分别为土地庙、路神神龛、宗祠，彰显了对“天、地、宗、亲”的神性沟通。民居群主要分三组，即广场正中为一组、两侧各有一组，每组建筑中间由横向巷道，在横平竖直的构架下又有良好交通渠道，如兴安水源头村、钟山龙道村、常家村、恭城上大营村，若人口增加，则在村庄中后部向两侧拓展，如水源头村在中部位置向两侧延伸巷道，具有很强向心性；钟山龙道村则由套院组合，土龙村则“五服兄弟”同居一巷，从而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芭蕉叶”组团。由于汉族村落离山有一段距离，村落发展也可向后部拓展，从而出现“环”形；“环”形布局在汉、瑶族同居一村较为常见，如恭城常家村。

^① “水口”具有风水学意义，即“一方众水总出口也”，是村落的精神门户。

（三）院落形态秩序

院落形态分为套院、单院两种形式，套院分为两种，即院中带院与同居一巷道。开间形式分为一间房、三间房、五间房三种形式。瑶族以一间房、三间房为主，汉族以三间房、五间房为主。

瑶族一间房又称“筒子房”，侧面开门，纵深较长，为套院形式，可一直向纵深拓展，一般有4—5道门，多则6—7道。富川凤溪瑶寨为传统农耕村落，进院落一侧为牲畜棚，向纵深分别为居室、厨房、浴房；恭城江贝村、六岭村进院落一侧为卧室，纵深分别为厅堂、卧室、厨房；恭城常家村、金秀六段村则进门为神龛，纵深分别为卧室、厨房、后院，最后是后院大门，“形状有拱形、长方形，要求坚固，一为防卫，二为拒鬼魅，因为按当地说法，鬼魅是从后门进入的。屋内还有左右两个特殊小门，即“隔门”，隔门平时关闭，一旦发生战事等特殊情况，全村各房子隔门都打开，即变成户户相连的通道。”^[9]此类院落形式尽管门面较小，但进门后豁然开朗让人别有洞天的感觉，体现了瑶族节约公共空间的民居精神。

三间房为瑶族、汉族共有的开间形式。瑶族原生态三间房为中间一间为客厅，客厅正中为神龛，两侧为火塘、餐厅、卧室，除正大门外，前后左右均可有小门出入，建筑与周边邻居均不相连，具有较强独立性，房前为一狭小空间，无院墙围拢，即可做通道，也可做天井，属公共空间与半开放空间之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富川秀山村有所保留。金秀上古陈、下古陈瑶族院落则对此种形式有所演绎，即保持建筑基本形式不变，院落基本形式也为横向狭长，但宽度有所增加，同时，有半墙围拢，墙高度为1.5米左右，超过人体重心，院落左侧为厢房，厢房与正房不连接，左侧为杂物房。院落门口一般不正冲街道，而是通过“之”字形台阶转折进入，有明确院落门口的构筑意向。

汉族院落以三间房为主，也有五间房形式，有严谨院落布局，基本结构为三间房天井、门楼，入户门一般以轴线中心，门楼构筑较为精心，进门有倒座（屏风之意）、门厅，两侧为厢房，门楼与正房之间为天井，天井两侧有厢房或连廊。由于本地气候潮湿，一般为两层楼结构，通过天井两侧厢房连接，整体建筑则“走马串脚楼”的院落样式。若为套院，一般为上、下两院落或上、中、下三院落，上院后面为后花园，花园一侧为后门。五间房与三间房整体布局相似，只是开间多了两间房，灵川县三街村以此形式居多，三街村原为灵川旧县城，古院落建造者

以商人、读书人居多，体现了建造者对人居空间的奢华大气追求。

三、桂东北瑶汉古村落民族文化融合

（一）汉族村落中原特征保留与地域适宜性的改变

自秦、汉时期汉族自中原南下至广西带来北方建造观念，不仅随中国整体建造风格改变呈现时代变化，同时也对地域环境有所适宜与借鉴。首先，本区域院落基本以北方合院形制为基本型，有明确院落界定与天井概念，天井的意义不仅在于与天宇想通，也是主人“自省天地”半私密空间，在降雨量少的北方，天井可为平地，由于本区域降雨较大，在保留天井基础上导入“四水归一”的风水学意义，并将天井深度有所加深。侗族、瑶族、壮族对于空间功能区分并不明确，而汉族则保留儒家思想观念下的秩序性，将厨房、厕所等空间设于主体建筑之外，并根据长幼秩序确定居住空间。

北方合院建筑更强调封闭性，不仅有防御意识，也有保温功能，而瑶、汉族古村落建筑为适宜地域气候，将防潮、通风、降温做为建筑重要因素，在保留基本形制基础上，将构筑物尽量敞开，正房入户门以六扇杉木门为基本结构，采取灵格式骨架，木雕所占面积较少，以漏雕、透雕为主，尽量保持通风，同时二楼屋顶与墙体交界处尽量通透，采用悬山样式以避免雨水浸入，屋顶陡峭利于顺水，屋脊尽量以曲线行驶处理，建筑整体形成俏丽、轻盈的建筑格调。^[10]

马头墙为赣派、徽派建筑特色，以“阶”或“叠”为落差处理形式，并有丰富视觉审美效果的功能，其中蕴含的“马”吉祥意蕴及防火的实用功能被瑶、汉族古村落民居所借鉴，而对于马头墙的处理则为直线的跌落式与曲线结合运用，不仅在形式上更优美，同时也更适宜区域气候。对于马头墙的处理为桂北民居建筑的特色，由于山地形式制约导致构筑空间较小，而高密度、小尺寸的马头墙处理更凸显民居装饰的复杂性，如富川红岩村翘脊、弧线、直线等综合造型运用，将村落天际线处理形式更加丰富，从而强化地域特色。

（二）瑶、汉族文化的相互吸收与改变

尽管瑶、汉族文化整体文化势能高低有别，但两个民族对村落景观处理形式互有借鉴。汉、瑶族的互相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山体、水体的利用上，汉族对山水元素的利用更多体现在风水意义，瑶族更注重应用及生态保护，如对“后龙山”的保护，瑶民轻易不踏入后龙山，并任其植物生长，砍柴一般也

要到距离较远的山上,不动后龙山一草一木;而引水入村则具有实用功能,对水的利用形式丰富。瑶族对山水元素的生态理念在切合汉族风水观念的基础上,对山水的利用也进行了强化,如恭城六岭村为汉、瑶族共处村落,因商业而发达,不仅有本地瑶族,也有外来商人,村落选址不仅靠近大河,也泉水涌出,村内瑶族“一间房”建筑呈“一”字形排开,汉族民居则瑶族旁而建,村落内泉水则按照瑶族对水的利用功能分为饮水、洗菜、洗衣各种区域。

瑶族民居的随意性而因汉族的秩序性影响有所改观,如恭城上大营村,正房与天井间为通道,这与汉族民居有很大差别,但其整体布局采用了汉族方正轴线样式;同时,因受汉族影响,瑶族民居也开始做装饰,装饰部位也选择在视觉中心位置;两民族对装饰纹样的运用也有所差别,如即可以运用以纯粹自然审美意义的纹样,也可以运用有象征意向的吉祥纹样。

瑶、汉族对民居材质的运用则有相互借鉴之处,原生态瑶族民居以杉木柱为构架、以杉木板为地板或隔板,并有天然石材为柱基,运用干栏式建筑样式将民居分为上下两层,且上层通透性较好;汉族则以石、木结合为主,北方合院一般为单层房屋,封闭性强,两者互相借鉴的结果则呈现出以两层为主,材质以石、木结合,并有卵石等材质为辅,民居取材丰富,建筑样式多样。同时,瑶族“一”字形村落对商业型古镇有启示意义,如大圩古镇,因靠近漓江方便物流,整个村镇布局以“一”字形为主,通达度较好,因经营门面面积局促,则采用瑶族“一间房”样式向纵深发展,从而做到产品加工、居住、生活、经营、洽谈等多功能民居样式。

四、遗地精神提取及保护机制

(一)对遗地精神内核的提取及价值要素分析

桂东北古村落遗地精神体现了区域历史人的生存状态,同时,作为物质遗产的村落糅杂了非遗文化存在,体现了历史人对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协调统一。其精神内核宏观表现为:其一是山水自然生态要素与人居理念的适宜结合,具有自然与文化属性的双重遗产内涵;其二是人群视觉审美与生存价值取向相统一;微观表现为:“大公小私”人居精神指导下的构筑品质,如:瑶、汉族对古村落的规划、建筑风格的设计定位、建筑材料的选择等。由此而知,古村落文化价值要素为:造物思想为从自然生态认知到适宜性改造;适宜性改造表现为造物取材维持其物理性;坚固耐用的造物品质;对民居文化象征的精神审美。

桂东北古村落具有文化地域趋同性,又有其个性。民众对人居理想的极致追求具有趋同性,即趋吉避凶、子孙兴旺的一致性。其个性体现在追求方法及自然地理差异所导致,如追求方法差异:瑶族对于居山的意向及节约耕地选择在山地建房,汉族对负阴抱阳风水观念理解选择在地建房,结果显示村落选址都有落差性,即殊途同归,而对相似地理落差的利用则呈现不同形式,如落差为3米的地势建造院落,则出现三种样式,如金秀瑶族处理方法为主房与院落为同一平面,院落外为一落差,通过台阶处理落差;而融水同练瑶族则落差选择在主房内,即把地削成一个“厂”字形的土台,主房一半用土台做室内一半用长木柱支撑搭建木板做地面;而钟山龙道村则将落差选择在主房与院落之间,但三种院落建造法前提都是以不破坏地理生态及保证主房屋向阳、通风的居住理念。这种造物思想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风格协调表现各异,即在文化象征的一致性前提下丰富各异的视觉表现,有别于现代快速复制的“千村一面”的单调格局。^[11]

(二)保护策略

1976年通过的《内罗毕建议》与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公约》分别提到区域性古民居的系统价值大过单个建筑价值及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保护,保护是指鉴定、防护、保存、修缮重生四个环节。桂东北区域民居具有区域文化共性,看似普通却有整体保护价值,且因人地关系适宜具有双重文化遗产属性。

瑶、汉族古村落根据现代人对房屋居住情况分为整体有人居住、半居住、无人居住三个状态,保护措施,第一,政府已做保护措施;第二,已有明确保护意向,但措施尚不到位;第三,无人关注。因此,本区域古村落基本呈现荒废、倒塌趋势。古村落荒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后一些房屋重新分配,几家人共居一院落矛盾丛生,赶上进城务工即迁离原住处导致房屋无人修缮;年轻人更喜欢跟随社会潮流用现代材质与建造理念导致旧房拆迁或荒芜,现状为一般老年人尚居住旧房且无资金修缮。^[12]

保护措施主要分为三种:旅游开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修缮模式,可通过政府购买、集团购买与开发、村民自治三种策略。旅游开发主要针对自然风光良好、古村落旅游价值高、交通便利的村落,可对单个村落开发,也可对相似度较高且距离较近的村落群采取串珠模式整体开发,形成观光线路。旅游开发要遵循古村落“原真性”,采用保护规划模式,进行圈层设计,即古村落核心区、风貌区、协同

区三个层次,以古村落文化旅游(富川秀水村已开发)与乡村“农家乐”生态游模式展开(钟山矮寨村已开展);对于交通不便,且生态性好、民居特色鲜明,有独特民族特色村落,可采用生态博物馆式保护,如金秀上、下古村;对于居民众多、有良好开发性村庄可采取村民自治原则进行保护,主要采用修缮模式,如钟山巨塘村、石头村。

五、结语

桂东北地区古村落众多,其中瑶、汉族民居特色鲜明,有一定文化脉络特征,主要为:汉族村落空间布局的文化象征性、村落秩序性、建造美观性;瑶族民居“依山建茅”的生态理念在“沿地取风”历史环境中形成民族特色样式,其特色体现在“筒子楼”、“之”字形布局等原生态民居。在寻找适合保护策略前提下,古村落规划模式对当代社会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有启示作用,如根据生态承载力确立人居数量、以遵循自然为前提适应性改造、村落规划模式合理性、建筑风格及文化内涵延展等。

参考文献

[1] 张有隽.瑶族历史与文化[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264—269.

[2] 刘沛林.徽州古村落的特点及其保护性开发[J].衡阳师专学报,1998(1):31—36.
[3] 袁丽红.壮族与客家杂居的空间结构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9(1):119—126.
[4] 张益桂,张家瑶.桂林史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7.
[5] 吴永章.清代广西瑶族分布述略[J].广西民族研究,1993(2):51.
[6] 郑维宽.论宋代以来广西瑶族的山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农业考古,2012(6):346—351.
[7] 熊伟.广西传统汉族民居分类及区划初探[J].华中建筑,2011(12):179—185.
[8] 蒋子杰.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现代建筑设计[D].浙江大学,2012.
[9] 朱涛.金秀瑶族建筑探访[J].广西城镇建设,2009(2):107—110.
[10] 王丽.桂林地区汉族民居特色的研究与继承[J].山西建筑,2008(22):40—42.
[11] 汪书锋.快速乡村城镇背景下的古村保护规划研究[D].广东工业大学,2013.
[12] 陈小红.传统聚落型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Ancient Villages of the Yao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in Northeast

ZHOU Hai-jun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e,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migration, the northeast Guangxi was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Yao's entry into Guangxi. Therefore, the ancient village in the northeast of Guangxi formed the basic matrix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cient villages by the cultural gene of Yao and Ha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the Northeast Guangxi,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layout, the concept of Fengshui and the cultural symbolization of the Han nationality's villages have brought about an impact o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Yao nationality. However, the 'one' layout of the Yao nationality provides beneficial inspiration to the space management mode of the ancient towns along the river; Yao and Han villages achieved the village space diversity of 'homogeneity' through different space planning, in the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ideal of pursuing good fortune and avoiding disaster and thriving offspring. It also reflects the fusion, suitability and extens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Yao and Han ancient village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Yao Nationality; Ancient Villages; Historical Context